

徐中玉 自选集

上 / 海 / 著 / 名

学 / 者 / 文 / 集

重庆出版社

上 / 海 / 著 / 名 / 学 / 者 / 文 / 集

徐中玉 自选集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中玉自选集/徐中玉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9. 10
(上海著名学者文集)

ISBN 7-5366-4467-1

I. 徐… II. 徐… III. ①徐中玉-文集②古典文学-文学
研究-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2695 号

责任编辑 曾海龙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费晓瑜

徐中玉自选集
上海著名学者文集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75 插页5 字数474千
1999年11月第一版 1999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 7-5366-4467-1/B·97

定价:35.00 元

策 划 陈学明
主 编 李书敏
副主编 蒲华清



作者像

作者小传

徐中玉 1915 年 2 月 15 日生,江苏江阴市人。1934 年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治古代文论。曾在中山大学执教 5 年,1946 年回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48 年暑后任沪江大学教授,兼同济、复旦两校教授。1952 年到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历任中文系副系主任、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徐中玉先生长期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著述宏丰,见解独到,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徐中玉先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艺理论研究》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主编、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

作者题记

我自高中师范科毕业后即开始试行写作，为县报供稿。1934年考入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出于爱好也为自给学费，为一些全国性报刊撰文，还为天津、青岛两家报社编过周刊。散文、小品、杂记、小考证、小说、较大的论文都写。从杂著到趋向研究，总之都是尝试的习作。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内迁，并校到了重庆的中央大学。1939年毕业，去云南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治古代文论，这时主要读古书，但仍写了不少抗战文学问题的文字。在研究古代文论的时候，注意到了同时需要关心现当代文学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联系起来，有所汲取，庶几才有现实意义。研究院毕业后，留在中山大学任教5年，直到抗战胜利才从广州北返回母校山东大学工作。1948年回上海，在沪江大学并同济、复旦两校兼课。1952年院系调整，来华东师范大学任职至今。没有离开过大学之门，先后出版了三十多种专著。青年时期目击时艰，又辗转道路，情绪激进。建国之初，为久已盼望的新气象所感动，深愿响应号召，改造思想，学步走路。但积习甚深，总未能走好，有所贯

通。对“反右”之前已经发动的各种批判，都不知所可，究竟政治与学术如何区分，要否适当区分？稍后对胡适、胡风两位进行激烈的批判，尤其引起广泛的震动。我并不熟悉他们的著作和思想，感到用这种搞运动的方式不可能真正解决学术上的问题，不理解为何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为何在学术范围里也只能有一种思维方法，一种现成结论。到1957年，一张“反右”的大网终于也罩到我的头上来了。专横的不容分说的“批判”狂风暴雨从所未经地向我咆啸而来。

从1957年夏季开始，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整整20年，我被剥夺了写作、发表的权利。只是由于自己对知识的信念，没有使我干脆丢掉书本，没有使我忘记继续注意资料的积累。文化专制主义必然长不了。“左”的垮台比人们料想的还快，人们终于看到了希望、曙光。

在这20年内，我除了为自己增加了不少资料性的卡片外，写的就全是检查、批判、监改日记和各地前来外调者“勒令”我必须写的材料。谢天谢地，我没有听说过要我写材料的朋友、同行、学生中有一个反动分子。

1978年，我终于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从“右派”到“摘帽右派”到“老右派”再到完全走出了这个沉重的阴影，以年已63岁之身，重新担任校内外教学行政各种职务。同时勉力恢复研究工作，再次提起笔来写作。哪怕仅有一点微薄的绵力，也愿完全用出来再做点事情，证明文化专制主义是多么荒谬、野蛮。

选收在这里的文字，都是近20年里写下而已发表过的。大体是打通了古今来谈，是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较有针对而写。这是我多年前的想法，我不想把自己的工作变成只是“书斋之学”。文字虽全写成在近20年中，有些议论在20年中带有波涛回荡的痕迹，存真都不删改。

多年来,我们在政治上走了“左”的大弯路,导致学术停滞不前,人文社会科学尤其闭塞。“阶级斗争为纲”,越抓越落后。把50年代之初一个好端端的开始几乎搞成一个信念毫无的乱局。姓社与姓资、革命与反革命的争论,假大空的套话、大批判,不知有多少,实际起了什么作用?解决了几个实际问题?诚应切切实实,实事求是,公正公平公开,最广泛地团结大家一起来办些实事,做出一些实绩,重新开始,重建信念。20年来,确实已有了改进。这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

现在,经济上我们已有起色,学术上还待用力,人文社会学科建设尤须开拓。意识形态方面也不是不能互相补充的,绝不相容的对立,唯己独革式的争论,显得多么武断、徒然。随着交流的增多,沟通的渠道更便利,过去在许多问题上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会更显得太不明智。改革的大方向明确: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要考虑国情,也不能容忍落后的国情。要兼收并蓄,融会中西之长,择善而从。

当前,我认为在文学艺术工作上,在开展学术研究工作上,一定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不要横加干涉,重重限制。百花齐放,不是过去那样把很多花看成毒草;百家争鸣,不是过去那样只让自以为是“正宗马克思主义者”得以自在驰骋,仍把其他很多家放在只可做反面教员的位置。那就根本谈不上改革、开放、现代化。研讨学术问题只有无禁区,才能收到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真理愈辩愈明的社会效益。学术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脱离政治,但政治行为与学术行为毕竟有区别,创作自由与学术自由,应该得到法律的保障,不幸时代的余悸,需要继续消除,要多鼓励具有理论勇气的闯将作出创新成果。不要从意识形态出发,在他们的语言、文字上随意找什么岔子。

我很赞赏邓小平同志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

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所讲的这些话：

“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

“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条件，也在日益成熟。”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精神，后来又由党中央的代表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作了重申，即“创作必须是自由的。”小平同志这里是在谈文艺事业，讲话的精神同样适合于繁荣学术事业和一切科学研究事业。这些讲话的发表是在20年前，不消说，现在贯彻“双百”方针的条件已比以前更加成熟了。

我在这20年里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但我并不认为我的看法都一定是对的，完整的，我只是说出了我的看法，力求研究工作能同现在遭遇的新问题、新情况联系起来，使我的工作不致成为空谈。衷心希望得到同行学者专家们予以匡正。我有的多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并没有什么煌煌理论体系，具见文内，这里就不多说了。

1999年1月15日

代序：忧患深深 80 年

——我与中国 20 世纪

—

我生于 1915 年 2 月 15 日。故乡在江苏江阴。家里没有一亩地、一间屋。母亲来自农家，不识字，父亲以中医为业，过的是清贫生活。两个姐姐都只读完初级小学便辍学在家，给袜厂摇洋袜，挣的钱只能培植我这个男孩。我小学毕业后还去邻镇杨舍（即今张家港市治所）读到初中毕业。接着考上免费还可供饭的省立无锡中学高中师范科。毕业后按章老实当了两年小学教师，凭服务证才得考入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七七事变”后随校内迁，转入重庆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读完大学。又去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当研究生两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辗转教书，至今始终没有脱离校门做过别的工作。读师范时不用花费多少，读大学一年级时花的是当小学教师工资的积余，后来一直靠写稿自力更生。高中以前我一直未知茶叶为何物，以为茶梗也算茶叶，因那时祖

父当家，尽量节约，从不买茶叶，夏天便喝家里自炒的“大麦茶”。这种家境对我有深刻影响，我的人生道路就是这样开始一步步走出来的。“五四运动”兴起时我还很小，读初中时才听说有这个运动，要打倒卖国贼。那时提出的民主、科学、新道德这些要求，再晚一点我才大致明白。“五四运动”虽然间接却仍给了我这个江南乡镇初中学生重要影响。我现在仍感谢前辈们这个先行的业绩。七十多年来我们已有了不少进步，帝国主义列强不能再对我们为所欲为了，旧军阀打倒了，租界和治外法权收回了，很多国耻纪念游行已不必举行了，都是好事。当时提出的较高要求至今仍待我们努力去达到，进步没有止境，纵向比较必须同时再作横向比较，才不致浅尝即止，自满不前。多少年来我们缺乏危机感，失去紧迫感，似乎闭关锁国没关系，自我感觉曾还好得很。

我可以不读私塾而进初级小学了，教师不是“秀才”先生而是多少受过新思想熏陶过的人。江阴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乡镇子弟家境稍好便去常州、无锡、苏州升学，有些教师就是回乡工作的这种人，脑子里多少有点新思想。记得初级小学与高级小学校牌上都写有“新制”字样。祖父常说“这种学堂洋派多了”，又称“洋学堂”，主要指其“开通”。语文课本开头教“人、手、足、刀、尺”，不是《三字经》。每天早上到校的第一件事是集体肃立向上升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敬礼。

六年小学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五月，要参加好几次国耻纪念游行。五月四日是纪念五四反帝反卖国贼运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就是我们手执小旗上所写和跟着教师口里高呼的口号。纪念实际上是为了提醒不可忘记耻辱。1928年5月3日发生了“五三济南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我济南，打死中国军民，杀我外交官蔡公时。这后面是5月9日，还有“五卅惨案”，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枪

杀顾正红等中国工人、市民。华士镇虽不大，但周游也要一两个小时，当时不大了解这种行动的重要作用，后来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奋图强，誓雪国耻，要求进步，坚主改革，不论在什么环境，困难下总抱着忧患意识与对国家民族负有自己责任的态度，是同我们从小就受到的这种国耻教育极有关系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不是说个人有了不起的力量，而是说每个人于国、族兴亡，都要负起自己应该并可能承担的责任。当时一听到列强要把我国“瓜分”，迫使我们当“亡国奴”，就极为愤恨，既想到国族受欺压自己连带要受罪，自然便想到为此自己即应承担一份责任。

国应当爱，人类也应当互爱。当存在国家与民族之别的时候，当然应先爱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然后再推及世界、人类。自命超越，连本国本族都不爱，就谈不到泛爱世界与人类。厌恶甚至痛恨本国本族确实存在的弱点、缺点，正是由于爱，希望变好，“恨铁不成钢”，不是一味恨而实在爱得极切。这里有祖宗庐墓，有父母兄弟姊妹，有亲戚朋友，有故乡山水，有优良的共同文化传统，有基本一致的现实利害关系，在哪里都找不到可以如此自在、发挥作用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志士仁人都有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这是爱国思想最重要的基础和来源。这同政权并无必然的关系。千百年来政权时有更迭，有好有坏，好坏无常，但中国人民的爱国思想并未时有时无。当然，进步、开明的政权能使人民的爱国思想更强，凝聚力更大。我们过去热爱祖国不等于热爱旧政权，恰恰相反，很多知识分子对它持批判甚至反对的态度，因而才显示出深刻的爱国之心。

江阴有个小小典史阎应元是著名的抗清反暴英雄，他率众扼守江阴孤城，力抗满清南下大军八十多天，最后失败牺牲，江阴因此被称为“忠义之邦”。阎应元原就住在华士镇郊

乡村，他就是从我故乡奉召去县城任典史之职的，死后乡人为纪念他的忠烈，建立昭忠祠奉祀他。我就读的高级小学，即由这所“昭忠祠”改建而成，当时厅堂里仍摆着他的塑像和不少同他一道就义者的牌位，有副对联，表扬他有“天地正气”，是“古今完人”。厅堂变成全校师生集会的礼堂，我每天来回总要在他像前经过几次，有两年之久。所谓“正气”与“完人”，我似懂非懂，但对这位乡贤确实非常尊敬，六十多年过去了，回忆仍很清楚。

就在这里读高小一年级（即今五年级）时，级任老师兼教我们语文课的陈唯吾先生受到了我们真诚、热烈的欢迎。他不但教书活泼生动，教学态度也非常亲切热情，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课，同他接近。但不到几个月，忽然不来了，不知是何缘故，问问别位老师，或说不知道，或含含糊糊。同学们非常盼望他回来，他终于不能回来了，据说已被捉去杀了头，只二十多岁！究竟是怎么回事，几十年都未明白，可他的形象一直在我心里，直到几年前江阴市为乡前辈刘半农先生等三兄弟建成“三刘纪念馆”，邀我回去参加开馆典礼，便道参观了市里的革命烈士纪念馆，才终于明白了陈老师为革命而牺牲的真相：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在基层工作，哪里有困难就调他前往，牺牲时已任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被捕杀头。保留的一张照片分明是当我教师时那个样子，年青而果决，我的怀念已有分明的着落。高小两年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阎典史和陈先生这两个人。

那时江阴“农民暴动”此时彼伏。去杨舍镇读梁丰初中时，有个晚上突然听到镇里响出枪声，人声鼎沸，谁也不知出了什么大事。校紧闭大门，我们都从床上爬起，挤作一团。天明后听说已没事，大家才敢去镇上看动静，原来是数十里外的农民有组织地赶到这里来“暴动”：夺枪械、弹药，“抢”典当，向

几户地主借粮、借款。此外秋毫无犯，早在后半夜起就迅速撤走了。

这使我简单地联想到所读《水浒传》时赞赏过的劫富济贫之举。

不消说，这样的活动在人烟稠密的故乡是很容易被发现、被破坏的，于是就传出了很多“有人被杀头”的消息。当时这样做太冒险，但我很同情这些受害者，因为我知道乡下有很多贫苦人。我外婆家就在乡下，那个村里农民借债还不出，作抵押的土地隔三年就要交给债主，变成佃户，如再欠租，那就说不定哪天还得被抓去吃官司。烈士们的牺牲精神不死。

1931年在无锡读高中时我遇到了“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引来全国群情愤慨，上海各大学学生发起去南京请愿，要求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我参加了无锡学生对上海学生的支援，上了拦下的火车和同学们一道前往南京。到南京后立即被大批军警截往当时的“中央军校”住下，当晚听到蒋介石的讲话，重申其“当然要抗日，却应先安内再攘外”这个调子。大家不满意，第二天一早便被载去中山陵谒中山先生墓，下午大批军警又把我们赶上火车，押回无锡了，此行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毕竟表现了我们中国的民气。当时我订阅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很爱读他写的《小言论》，我们年级订阅这个刊物的同学有十多位。游行回来后我们全参加下乡宣传抗日的队伍，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类工作。

1934年暑后我到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继续求学。青岛有很多日本侨民，其中不少是派来制造事端的日本“浪人”。前海经常有日本军舰停泊，有时竟卸去炮衣，把大炮口针对着我青岛市政府大门。东北三省已经沦陷，眼看青岛亦危如累卵，亲历此境，十分沉重。接着是冀东紧急，进一步波及北平、天津，整个华北动荡，导致屈服妥协的几次“协定”。“一二·

九”学生运动应时蜂起，各地同学纷纷响应，青岛山大学生以及很多中学生一道参加。那时我们读到《生活书店》出版的部分进步书刊，特感新鲜，对社会问题有了一些认识，使我没有一味钻进读书和学习文学创作的兴趣中去。我参加了进步同学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街头演讲及下乡演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和《张家店》等），不会演就帮做些杂事，写点宣传抗日的文字。在此之前我原是清静宽敞的图书馆中常客。这段生活充实了我，也结交了一些好友，他们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后来介绍我参加，我欣然参加了。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开始全面抗战，当年11月我随校辗转西迁，好友们分去各地参加打游击，直接抗击日本侵略者。建国后知道其中有的已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有的担任各种重要工作。他们在和我同学时大都是地下共产党员，随时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我由衷敬佩他们，觉得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民族的脊梁。

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继续学习，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我决心在自己认定的工作与生活道路上，学习这些同学、好友的志气和精神。我们曾互相这样勉励：做个正直的，坦率的，对国家社会多少有点奉献的人，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不灰心丧气，当然并不是有了这种愿望就真能成为这样一个人，但觉得这应是我的价值观之基点。

我读完大学已找到不差的工作，同时报考了研究院。接到录取通知后，我毅然即由重庆前去昆明南面的澄江。文科研究所设在县城外荒山上一座名叫“斗姥阁”的破庙里。就在这里我力求保护着与大学好友们的联系，开始读书，积累资料，思考着各种问题。好友们行踪难定，联系终于中断，但他们的精神面貌一直烙印在我深心里，对我来说，他们是最具体的榜样，当时我对革命者的一些认识多来自感性。为文学兴

趣所限，也由个性与认识有关，我对太抽象的思辨每觉近于虚玄，未免偏执，我觉得胡适文章的明白清楚，朱光潜论文谈艺的具体生动有趣，不简单，他们深通西文，研究中国问题，极少常见那种生吞活剥，佶屈聱牙，硬装出来的洋味。批胡高潮和“文革”浩劫中胡被目为战犯、洋奴，“文革”中朱被目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尽可驳斥或不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难道他们不能算是认真的爱国者？总算现在对他们已改变得比较客观了，采取客观态度才可以团结一切应该团结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我主张抗日到底，反对投降派。抗战胜利后我在广州和青岛参加进步文艺工作，支持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被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密报当时教育部，说我有“奸匪”（指共产党）嫌疑，朱家骅即密令我的母校山东大学把我与我向无政治兴趣的妻子一并中途解聘。上海解放前夕我与姚雪垠合编的周刊《报告》第一期出版立即遭禁，其中我写的一篇论文便是《彻底破产的教育》，为此几遭不测。解放初期我极为一派清明的开国气象所感动，甚至也紧跟过照批俞平伯、胡适、胡风诸位。号召帮助整风时还是应领导与各报刊之“热情”邀约，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上写了几篇文章，结局是被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主要罪状据批为主张“教授治校”，在大学里居然可以“学术至上”，定案后把我赶出中文系，降去图书馆库房整理书卡，株连妻子受歧视，儿女升学难，就业难，跟我一起，蹉跎十几年，迟至1961年我才得以回系继续任教。1966年“文革”开始，我和许杰、施蛰存又被首先投入“监改”，从“右派”而“摘帽右派”而“老右派”，直到“文革”覆灭，得到彻底平反，整整蹉跎了我二十年最可以多做些工作的宝贵时间。我们不知说了写了多少对新社会的歌颂却被说成是“抽象肯定”而于应邀之后仅对个别事情、个别人所提的意见建议则被说成是“具体否定”。越分辩